

大同文史

第一期

贈閱

一九八一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同市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办公室编

前 言

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同志在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讲：“我们相信，人民政协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中，必将发挥它重大作用”。这是人民政协工作的方向，也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

“大同文史”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在市委领导关怀、文史委员会积极努力下，要和广大读者见面。由于我们文史办公室几个承办这一业务的同志，文史水平很不适应，尽管采取了广征博采，严守尊重历史，忠实于历史的原则，很难达到弥补文献之不足，匡书刊之谬误，提高我们自己和教育后代，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发挥承先启后，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作用。抢救文史实属紧迫工作。时光流逝，岁月的推移，人事的代谢，湮没宝贵的史料，损失难以弥补，再不重视和紧抓，严谨地对待文史，将要犯重大的过失。我们决心以：“老牛遥看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亲自动手，秉笔直书；贯彻三亲的指导思想：亲历、亲见、亲闻，切实坚持“存真、求实、抢救”的方针；

力争把失去的时间尽力夺回来，被耽误了的事情用全力进行补救！文史是历代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应认真地继承和批判地接受，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毛主席早在四十年前就曾说过：“革命领导人，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现实的理解，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时间的延续，是分割不开的；不了解昨天，就不能全面理解今天，更无法正确地预见明天”。我们承办文史是为了借鉴自己的文史经验，使之能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故热切希望文史工作者，热爱文史的同志，给我们以支持和帮助，促使《大同文史》逐步充实和完善，为振兴中华，完成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发挥它应当发挥的重大作用。

大同市政协文史办公室

1981年10月13日

目 录

- 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同市政协 (1)
- 二、大同辛亥革命纪要……………大同市政协 (10)
- 三、辛亥大同起义初探……………陈朝仁 (16)
- 四、辛亥大同“同盟会”的活动和作用
大同市政协文史办公室整理 (25)
- 五、辛亥忻代宁公团在大同的功绩概述
大同市政协文史办公室整理 (29)
附：公团被困大同告急书…………… (34)
- 六、山西忻代宁公团北伐纪略……………牛诚修藏稿 (37)
附：雁门怀仁战守纪略…………… (44)
- 七、忻代宁公团大同革命军政府与清军
和谈时的商定信约…………… (48)
- 八、清军纵兵殃民两则……………王振三遗稿 (50)
- 九、辛亥革命时在大同参加武装起义
建立功勋的人物简志…………… (52)
续范亭 续桐溪 王德基 弓富魁 宋世杰 李国华
李德懋
- 十、北行杂咏……………翟品三 (59)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正当举国上下和我市全体城乡职工群众，深入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叶剑英委员长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之际。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七十年前（一九一一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大地上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虽然革命归于失败，但却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给我们留下十分宝贵的教益。我们纪念它，重温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学习孙中山先生爱国主义的革命精神；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道路；对完成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要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以后，中国人民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所有这些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趋尖锐，帝国主义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奴役，敲骨吸髓，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而

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奋起自卫，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和斗争。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后，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卖国集团，曾经公开声明，它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是说，清王朝要彻底出卖祖国山河宝藏，出卖人民利益，甘心充当“儿皇帝”，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工具。在清王朝的无耻丧权辱国的大拍卖下，帝国主义割据我国领土，占据我国宝贵的矿产田园，随意杀害我国同胞为所欲为，逼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尤其是辛丑条约签定后，清王朝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怀抱，对内更加剧倾榨、搜刮。本来每年的财税盘剥是纹银八千万两，一九〇三年增加到一亿两，一九〇八年又增加到两亿三千万两，一九一〇年再增加到三亿两，十年之间，使人民的负担增加了三、四倍。倍受压榨、难以忍受的中国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斗争，当一九〇一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战争还未停，很快地投入反抗清王朝的战斗。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〇年间，自发的反清人民斗争发生了近千次，遍及全国各地，直接卷入战斗的群众不下数千万人。随着清王朝对人民群众倾榨的加深，斗争的次数和规模也逐年扩大。据统计：一九〇五年的群众斗争有八十多次，一九〇九年便达到一百三十多次，一九一〇年陡增到二百八十多次，清王朝这样丧权辱国的倒行逆施，早已挖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形成即将倒塌的大厦，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斗争，为辛亥革命开创了前提和条件。

在此期间，许多爱国前驱历尽艰辛，摸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先生就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一八九四年他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随后又组织了

同盟会。从一八九五年起，孙中山先生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不外三种类型：

- 一、由境外运送军火和起义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发动起义。如一九〇八年的云南河口起义，一九一一年的黄花岗起义。
- 二、单纯的军队起义。如一九〇八年熊成基安庆起义，一九一〇年黄兴等发动新军起义。
- 三、利用会党力量和借助人民反饥饿与抗捐暴动起义。如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一九〇七年潮惠钦廉等各次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由于没有深入发动群众都相继失败了，但它震动了国内外，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尤其是许多同盟会员，在历次起义中表现出来的赴汤蹈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鼓舞了更多革命志士奋起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年九月，在同盟会的领导推动下，由原日知会等成员，在驻湖北的新军中组成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组成领导武装革命的机构，准备相机起义。在武昌小朝街设立总部，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经长期给湖北新军做宣传组织工作，新军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和他们有联系，成为当时起义的主要力量。

十月九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失慎爆炸。沙俄巡警闻声赶到，将起义用的旗帜、符号、文告、

印信等重要物证搜查，起义计划暴露，蒋翊武即发布紧急命令，通知革命党人和有联系的新军，当晚十二时以鸣炮为信号，发动正式起义。斯时，总部突被清军包围，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蒋翊武逃走，革命党人的名册被搜走。次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英勇就义。清帝的走狗瑞澂下令关闭城门，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并扬言要把革命党人斩尽杀绝。于是新军中的一些革命分子，当晚七时，在武昌城内新军工程营熊秉坤、金兆龙等为首的先导下，正式举行起义，奔向楚望台军械库，夺取枪枝弹药。新军各营和军事学校的学生闻风纷纷起义。进攻总督衙门，瑞澂逃到停泊在长江的军舰上。起义军占领整个武昌。十一日晚和十二日晨，驻汉阳和汉口的新军积极响应，革命首先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影响下，湖南、陕西两省首先响应。十一月初，上海也起义响应。到十一月下旬，全国二十五个省，已有十五个省宣布独立。清政府的帝制统治，即行土崩瓦解。

从标志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之日起到十一月下旬，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这就面临着如何建立统一的政权的问题。以武昌的“民社”和上海的“共和统一会”，形成互争领导的局面。

当时，力图扩张在华势力的帝国主义，看到声名狼籍的清王朝，已经失去镇压革命的能力，便改变手法，积极扶持他们认为更合适的走狗——袁世凯，以绞杀中国革命。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处境困难的清廷于武昌起义的四天后，即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对此职务表示冷淡，因有帝国主义的催促，很快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

广水陆各军，袁仍不满足欲望，回称：“宿疾未愈，请缓赴任”。十一月初，又改任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看到大权在握，欣然接受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任命，到北京就职后，四国银行团贷款支持袁世凯，英国公使朱尔典帮助他策划“南北和谈”。正当上海、武昌两地政客争夺领导权之际，袁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牵引下到达汉口。与此同时，袁命令军队加紧进攻革命军，夺取了汉阳，在龟山上架起大炮，轰击武昌。在袁的政治欺骗与军事压力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停战”“和谈”“清帝退位”。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国外奔走呼号进行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回国，由于他在革命中的威望，被推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在人民心目中宣告了清王朝反动帝制统治的结束。在内外反革命势力逼迫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妥协了。他于一月二十二日，指示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只要南方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公开宣布赞成共和，他就辞职。袁接到通知，立即布置逼宫，于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宣统）被迫宣告退位，革命党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次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阶级反清派的同盟虽然取得一定胜利，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妥协性，没有给农民以真正利益，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一九一二年四月孙中山被迫解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了政权，革命遂告失败。

辛亥革命在全国是这样。而山西辛亥革命的概况是：一九〇五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山西分会干事谷思慎先派荣炳回晋，次派赵戴文、阎锡山到晋，随着温寿泉、景梅九、

张瑜、续西峰、黄国梁、南桂馨相继陆续展开活动。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晨，山西响应起义。中午成立了军政府。杨彭岭倡议逼请姚鸿法任都督未遂。阎任都督、温寿泉任副都督、黄国梁为参谋长。即分兵三路，支撑当时的局面。一、娘子关：姚以价、赵戴文、乔煦带兵两营。二、北路：张瑜、续西峰、王建基、刘冠三、续范亭、续廷梅、弓富魁、忻代宁公团。三、南路：刘汉卿、李大魁、河东军政分府。

讲山西辛亥革命，却必须缅怀吴禄贞烈士的功绩。吴系湖北籍的留日学生，一九〇二年回到武汉，被张之洞委派担任湖北清军营务处帮办，他利用张之洞对他的信任，在清军和知识青年中努力传播革命思想。后来，他虽然奉调去北京，却为日后的湖北革命运动，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武昌起义时吴禄贞任六镇的镇台（即师长），曾被先派赴武汉镇压革命；由于山西近在肘腋，且已发动武装起义，即任命吴为山西巡抚。带第六镇入山西镇压革命，吴到石家庄后，即与山西的阎锡山、温寿泉约定：在娘子关会面，商议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任大都督，阎为副都督，山西出兵两营归吴统辖指挥，并准备在石家庄铲除袁世凯。相反，袁世凯授命周符麟以重金收买吴的卫队长马惠田，刺死吴禄贞，这对辛亥革命是个极大的损失，减弱了起义后防止复辟、窃权的主力。

袁世凯入京后，派芦永祥带兵一旅，在祁县、洪赵大肆抢劫财物，奸淫掳掠，留下极为恶劣的影响（曾被铸铁像以遗臭万年），当曹锟、芦永祥入晋时，阎、赵、黄数次集议，多主由太原暂时退出，到陕西与张凤翔靠拢。结果，阎、赵走北路，取道保德，到了归绥、包头。时值续西峰率忻代宁

公团被毅军包围于大同之时。斯时，山西局面之能以维持，首以河东军政分府，温寿泉、景梅九、杨彭岭、李岐山等的一切革命活动，加之陕西张凤翔支援；次则实由忻代宁公团、续西峰、续范亭、王建基等，在大同和雁门关内外，坚持抗敌的结果。三是，太原由护理巡抚李盛铎负责，谘议局梁善济应付，并由姚鸿法收集军警维持地方治安。晋南、晋北两股革命势力对当时维护山西局面举足轻重，关系至为重大。阎仅以孔繁霁、焦纯礼和杜上化、姚鸿法互相联络于忻州、太原之间。

据知，阎锡山之能以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实系其两面投机的骑墙作风、玩弄机巧权术所致。列举如下事实：

一、阎锡山由太原撤退时，南京军政部的司长仇亮亲眼看得十分清楚，并且对阎的行为甚为不满，认为不佩当山西的都督。

二、当时，李盛铎曾派刘璽训、叶古虹赴南京临时政府活动，想当山西都督；袁世凯也认为阎锡山去向不明。

三、阎派南桂馨到武汉、上海谒见孙中山、黄克强、胡汉民，使同盟会、铁血丈夫团承认他是起义的基本人员。

四、阎派谷如墉、董子安到北京，与段祺瑞接头，向袁世凯输诚。

五、讨好立宪派山西谘议局长梁善济。甚至和满清官吏姚鸿法信使往还打得火热，从而在起义前取得了标统职衔的兵权。

阎锡山靠近北洋军阀投降袁世凯；背叛了孙中山、同盟会；他为取得袁世凯的信任，排挤残害许多革命同志，终于在南北议和后，独吞了胜利果实，开始了对山西将近四十年的反动统治。

辛亥革命，未能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实现这一纲领的战斗的具体措施。革命党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革命队伍，始终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致使武昌起义后不久，就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为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准备。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使其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再也不能恢复辛亥革命前那种稳定局面，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对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对东方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个巨大鼓舞。

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近四十年，一再遭受挫折和失败，逐步觉察到工农大众和共产党的巨大革命力量，使他有了重大的转变，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认识到，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

正如毛主席对中山先生的评语：孙中山是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他站在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中国改良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在辛亥革命时期，他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他全心全意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战斗到最后一息。但对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充分理解。

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一，必须坚持爱国主义

革命精神，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兢兢业业地，艰苦地完成四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高度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第二、坚持爱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积极拥护叶委员长纪念中山先生的文章，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的谈话。促进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发挥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在建设祖国中的积极作用，为统一祖国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第三、坚持爱国必须发展和壮大国际统一战线，唤起人民群众，根据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反霸，共同奋斗，保卫世界和平。

值此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十分关切在台湾的同胞。望能尽早结束民族分裂的不幸局面，愿亲朋故旧、父母妻子兄弟姐妹骨肉团圆，回归祖国，振兴中华。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完成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大同市政协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

大同辛亥革命纪要

大同市政协

在辛亥革命前夕，大同地区也和全国各地形势一样，人民早已不堪忍受清政府的野蛮统治和压迫，更不能容忍其对外的丧权辱国。在这种情况下，富有爱国热情的人民，无不起来反对满清封建王朝。

一九一〇年同盟会派来山东刘冠山、王虎臣、湖北寇煜等志士来同工作。先与樊荣相识后，由樊引进，在九龙壁旁，开设的面铺内，秘密进行工作。后寇煜在大同府中学堂，担任国文教师，倡导革命。不久，同盟会又派来张丙辰、段亚夫两志士也来此进行工作。这些骨干到大同后，即与当地同盟会员李德懋（拳术家）、刘干臣（和尚、法名本悟）、高旭（天镇县旧知识分子）等密切联系。为了便于进行工作，李德懋以拳师为名，在九楼巷旁开设拳房聚众习武。刘干臣在吕祖庙也利用迷信组织随时集会进行革命活动。

同盟会在此开展工作不久，会员发展很快，已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为了掌握武装，曾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致力争取驻同清军。同时，又在大同中学堂设点进行工作。经过努力，巡警局巡官樊荣、电报局夫役徐寿山、退伍军人宋世杰、绿营军驻马口参将武万年（安徽省人）、镇台衙门大旗孙占标、孔献林、付殿臣、付殿举、马根义（职务不详），及中学庶务常珍、学监王冠、学生李国华、倪虎臣、彭继

先、和尚性聰、开连、常法、常育、拳房习徒郝贞、高保银等人先后加入同盟会，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革命的影响已逐渐深入人心，就连清政府的那些军政人员也有不少人 against 清廷表示不满。于是他们就相机策划，发动武装起义，以便推翻满清在明的统治。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和十月二十九日太原相继武装起义成功，大大加速了清廷的崩溃。大同总兵王得胜惟恐起义军从太原北出雁门，于是他一面速派大军赶赴雁门防守，一面又对革命活动采取镇压暴行。在大同起义的前五天，总兵王得胜将应县的同盟会员李子高、冯万才、王芝等捕杀处决。此时，大同同盟会的组织也被清军知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丙辰、段亚夫、刘冠山、王虎臣、寇煜等很快离开大同，留在大同坚持工作的会员，乘清军南调，城内空虚之际，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阴历十月十日）下午在西箭道付殿举家中，由李国华、宋世杰、高保银、徐寿山、付殿臣、常珍、孔献林、孙占标、马根义、刘干臣等研究，并确定了武装起义计划。是夜十时在少数武装起义军和革命人员的内外夹击下，打跑了总兵、知府和知县，顺利地占领了大同城。

这次革命的武装斗争，当时只有武装十余入，步枪六支。其部署：预先在镇台衙门旁和西北角龙王庙都埋伏有施放信炮（高升二响炮）人员，听候李国华在西城墙根鸣炮（婚丧事用的铁炮）为号，信炮一齐燃放。在信炮不绝声中，由宋世杰、付殿臣、孙占标、马根义等勇士鸣枪冲进了镇台衙门，作内应的孔献林开门迎入，守镇台衙门士兵闻声开枪阻击。英勇机智的宋世杰等这时子弹已经用尽，则改取政治攻势，以大义说服敌方。在这些勇士的大义感召下，

清军守兵亦倒戈向内攻击。总兵王得胜惊慌失措从后门逃走，知府李德炳，夜闻枪声四起，认为民变，也弃职逃跑；知县葛尚德逃跑不及窜到天主堂躲避。翌晨宋世杰、李国华、徐寿山、常珍、付殿举、付殿臣、马根义、孙占标、孔献林、刘千臣等开会，一面研究治安工作，一面成立临时军政府（原市人委院内），并公举李国华为都督、宋世杰为军事统帅、常珍为总参谋长。开始进行安民、收容散军等工作。至此，大同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城内曾一度呈现混乱状态。反正的部分士兵和市民中的不良分子也乘火打劫。军政府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处决了数名不法之徒，从此，城内秩序才安定下来。

为了巩固革命战果，军政府一面布告安民，一面积极组织力量，扩充武装，严防清军反扑。逃走的总兵、知府和知县，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已向清廷告急救援。十二月五日，清军宣化总兵郭典邦率淮军杨荣泰（李鸿章部），毅军陈希义（姜桂题部）赶赴大同增援，驻扎在城东古城一带。太原革命军闻知大同已被当地革命军占领，火速派续桐溪、弓富魁率忻代宁公团北上增援。为了避免与清军中途作战，这支援军绕道北上，行至秀女村（大同城南）与清军发生冲突，旋继续前进。续桐溪率部进抵大同城郊，先头部队从南门入城，严阵以待。在续桐溪援军未入城前，地方士绅刘应昭、陈言韶、王相府、王世礼、祁魁、阎廷扬、张彦礼、薛永福、胡嗣温、韩国祯、吕明昭、武虎臣、刘宗祥、李千臣、郝绳祖、王廷元等十多人，怕两军作战遭受兵祸，遂奔赴古城迎接清军，他们在清军统帅郭典邦面前，把起义军的情况告知了敌人，并请清军从速入城维持秩序。清军听

说城内空虚，即派部队入城。当清军行至东门外时，即遭革命军在城上阻击，当场击毙清军数名，余皆向古城败退。这时清军统帅郭典帮得报，误认士绅为奸细，在中途气愤责骂，拟包围扫杀，经由知府李德炳出面解劝，这些士绅生命才得保全。郭典帮围城以后，两军对峙，不断发生攻防战。在此形势下，大同城内部分人愿与清军休战言和，但由于接受了士绅刘应昭等出城迎接清军的教训，其他士绅谁也不敢再蹈前辙，这个角色，只得让位于在华享受特权的外国传教士来担任。外国传教士想利用和谈作为他们的政治交易。瑞典籍传教士高乐古、耿尔升便于十二月十一日接受了这个任务出城与清军言和。在外国传教士与清军和谈期间，山西太原革命军也派灵邱杜上化偕同阳曲知县旗人光裕来大同与清军议和。这次和谈是在武昌起义军与清军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的。协议达成后，大同革命军南撤雁门关，大同防务仍由清军接管。但当时大同革命军中，有部分革命志士不愿南撤，避居当地，拟伺机再起。

大同和谈实际是阎锡山向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妥协。协议达成后，清军率部入城。入城部队是由郭典帮、杨荣泰率领的淮军和陈希义率领的毅军两部分合成的。淮军军纪不严，遂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阴历正月初六日）到二十八日在城连续抢掠放火，残民自肥，人民遭此浩劫，损失甚巨，总计不下白银十余万两。淮军的这一骚动引起了全城人民的愤怒。革命军领袖宋世杰闻讯从口泉（大同城西）赶来，他不畏淮军势众，立即带领少数武装与淮军相抗。市民看到宋世杰这一英勇行动，也就壮大了胆量，鼓起了勇气，据守西半城，上房以瓦石阻击淮军，同时并大声呼喊“打走淮军”等口号。在广大群众的反抗下，淮军被迫停止暴行，旋即奉令